

党委教师工作部学习简报

2022 年第 3 期（总第 19 期）

党委教师工作部编

2022 年 12 月 19 日

目录

带领团队探索电池新体系,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黄佳琦——紧跟国家需求做科研.....	2
东华理工大学教授史维浚: 踏遍山河探铀人.....	9
青年科学家陈树果: 我的科研梦, 尽在那片深蓝.....	18
中国工程院院士、南昌大学教授谢明勇: 小小益生菌发酵果蔬大产业.....	23
八旬教授曾繁仁: “做学问, 要从国家需要出发”	26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教育部关于落实从业禁止制度的意见.....	32

带领团队探索电池新体系，北京理工大学教授黄佳琦——紧跟国家需求做科研



黄佳琦课题组实验室一角，架子上为正在测试的电池样品。 丁小青 摄

人物简介：

黄佳琦，1984 年出生，2003 年至 2012 年在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学习，获得工学学士及博士学位，2016 年 8 月，以预聘副教授加入北京理工大学“人才特区”前沿交叉科学研究院，2019 年晋升为长聘教授，主要开展高比能电池能源化学研究。

前不久，黄佳琦摘得第十七届中国青年科技奖特别奖。该奖项两年颁发一次，特别奖只授予 10 人。

随着动力锂电池产业快速发展，目前商用锂离子电池能量密度已经接近理论极限。为了在未来产业竞争中赢得先机，国际科学家正寻

找有价值的下一代电池新体系。得益于一批科研人员的努力，在这条新赛道上，无论在基础研究还是应用探索上，我国都走在世界前列。黄佳琦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破解锂硫电池应用关键瓶颈，开展高质量的原创工作

做高比能电池，黄佳琦说自己恰逢其时。读博士时，他研究碳纳米材料，还开发了超长碳纳米管制备的新方法，科研成绩不俗。2011年，博士阶段的最后一年，他萌生了一个强烈的念头：将研究成果向应用推进一步。

那时，学术界希望寻找到能量密度更高、成本更低、使用寿命更长的新体系电池，锂硫电池被认为是新体系电池重要发展方向之一。

黄佳琦向记者解释他最初的计划：“硫绝缘，电极的导电性就差，从电极材料基本性质入手，我想借助碳纳米管优异的导电性，打通锂硫电池应用的一个堵点。”

锂硫电池走向实用，两个关键瓶颈摆在科研人员面前：正极动力学缓慢，怎么解决？负极界面不稳定，如何应对？破题，必须搞清楚锂硫电池的反应原理，从根子上着手。

“就像只有熟悉了树干，才能了解一棵树的全貌。处理导电性等问题，不过是在树枝上纠缠。”带着探索“树干”的想法，黄佳琦决定“追本溯源”——开展锂硫电池能源化学基础研究。

挑战接踵而至，由于是全新的电池体系，国际上还缺乏完整的研究范式，从设计实验方法、测试方案再到分析数据，一切都从零起步。

一头扎进去近10年后，黄佳琦一步步接近答案：2016年，从无

到有，提出了催化剂加速锂硫电池反应动力学新原理；2019 年，从有到优，又提出锂硫电池催化剂设计新方法。之后，进一步揭示了锂硫电池金属锂负极固液界面不稳定的机制。

“科研、科研、科研。”这个词，黄佳琦重复了三次。他说，自己的生活很简单，成天“泡”在实验室，不过时刻有科研新想法，日子过得充实又高兴，并不觉得累。

凭借一系列出色研究，黄佳琦团队获得国际同行广泛关注，相关论文成为所在领域的重要文献。30 多岁，黄佳琦已跻身国际锂电池研究领域知名学者之列。

今年 8 月，黄佳琦的工作——“锂硫电池电催化原理与方法”获得中国颗粒学会自然科学一等奖。“学界的肯定是该项工作阶段性总结”，他说，虽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自己准备闯入新的无人区”，开展高质量的原创工作。

既当专家又当“工匠”，国家需求是团队快速成长的关键

黄佳琦说的新的“无人区”，其中一个完成是完成锂硫电池应用验证。

化学工程的研究，讲究“以大为美”，这锤炼了黄佳琦对科研的“审美”：“如果往实用方向上推进一步，工作便更完美。”

做出小电池样品和设计出商用大电池，虽然合成路径相似，但实用化试制涉及工艺验证、参数调整等很琐碎的工作，令很多人望而却步。

“做科研不是自娱自乐。”与清华大学团队合作，黄佳琦带领团队既当专家又当“工匠”，一遍遍煅烧、打磨、测试样品，难关难过

攻关过，解决了锂硫电池规模化生产的技术、工艺卡点，为未来实用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黄佳琦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学霸”。博士期间，他摘得 2011 年度清华大学特等奖学金。独立做科研后，又带领团队接连攻克难题。

“做科研有什么绝招？”记者问他。

“必须理解所研究的问题，准确判断它的发展方向。”黄佳琦回答，科研其实是个笨功夫，自己也有进展不顺利的时候，但因为基础打得扎实，读的文献多，知道这是一个真问题。“认准大方向，看到了国家的需求，我们就有信心克服前进路上的困难。”

当前，新体系电池研究方兴未艾，黄佳琦步履不停。近些年，着眼锂电池未来 5 至 10 年的技术需求，黄佳琦布局了多个前沿课题：锂金属电池、锂电池高效快充、智能传感和安全储能……他和团队一次次引领前沿，取得丰硕成果。

以锂金属电池为例，由于负极比容量高等优势，锂金属电池是下一代高比能电池的有力竞争者。针对锂金属电池工程化遇到的界面不稳定、存在安全隐患等痛点，黄佳琦带领团队深入解析原理，解决应用的“卡脖子”问题。他指导博士生闫崇提出了锂金属固液界面反应中的双电层效应，受到学界广泛认可，为构建固液界面形成过程的完整链条提供了新视角。

近年来，黄佳琦迎来了收获期。2018 至 2022 年，他连续 5 年入选科睿唯安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其中 2021 至 2022 年同时在材料科学和化学领域入选。

“我很幸运，赶上科技创新的黄金年代，契合着国家的需求，找到了自己的研究兴趣，充分施展了科研能力。”回顾 10 年科研经历，黄佳琦认为，我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需求，是自己和团队快速成长的关键。

不同材料构成的电池体系，自然禀赋各不相同，适用的应用领域千差万别。黄佳琦说，双碳目标驱动下，我国发展新能源技术更加迫切，团队将紧跟国家需求，找准应用场景，力争将积累的成果为生产生活服务。

学生成长成才，是最高兴的事情

在学生眼里，黄佳琦既是老师，也是贴心的好兄长。

得益于北京理工大学的资助政策，2016 年入职后，黄佳琦便快速组建起学术团队。许睿是他入职北京理工大学后带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黄佳琦向许睿介绍自己研究课题的前景，邀请他加入团队。“黄老师很亲切，我们像同龄人一样交流，聊得很开心。”许睿回忆与老师初次见面的场景。

跟着黄佳琦读博士期间，许睿在金属锂电池领域取得了多项创新成果。今年 6 月，还获得北京理工大学学生最高荣誉——徐特立奖学金，该奖项每年仅授予 5 名博士生。

2018 年，许睿独立完成了第一个研究工作，但在发表论文时却并不顺利，连续被两家学术期刊拒稿。他正沮丧时，黄佳琦肯定了他研究的原创性，认为质量非常高。经过不断完善，论文发表后影响力很大，5 年内被 20 多个国家的科研工作者引用 400 余次，这极大增

强了许睿的科研自信。

闫崇是黄佳琦第一位博士生。2015年8月，他在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访学，原本计划两年后回河南师范大学工作。看中他的科研潜力，黄佳琦鼓励他到北京理工大学跟自己读博。

在北京理工大学，闫崇的科研能力得到充分施展，只用3年便拿到博士学位，比培养计划提前1年。之后，经黄佳琦推荐，到清华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并入选国家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2021年至2022年，闫崇连续两年入选科睿唯安全球高被引科学家，成为锂电池研究领域的新星。

“看到学生成长成才，是我教学科研工作中最高兴的事情。”黄佳琦表示。

只要有出国交流的机会，黄佳琦都会鼓励学生申请，积累国际学术交流经历。一次，闫崇希望去瑞典参加一个为期两个月的访学。然而，昂贵的机票让他犯了难。向老师说明顾虑后，黄佳琦二话没说当即表示给予支持。“在黄老师心中，学生的成长永远是第一位的。”

采访中，黄佳琦提到自己的导师——清华大学魏飞教授对自己的影响。“魏老师支持学生自由探索，只要学生把想干的事情想通了，就给予我们全力帮助。”黄佳琦说，带学生，自己传承的是老师的理念。

平等交流、相互帮助，黄佳琦和学生一起成长。刚到北京理工大学时，黄佳琦急需搭建自己的实验室，其中很多设备都是他和学生一件件挑选、装配起来的，“我们像一个白手起家的创业团队，是一个

战壕中的战友。”

这些年，黄佳琦的团队逐渐壮大，已经从两三人发展到一支 30 多人的创新团队。受北京理工大学“青年科学家工作室”项目的支持，黄佳琦还正联合具有交叉学科背景的青年团队，面向国家需求，不断开展新的探索。

放眼未来，黄佳琦认为，国家需求为新能源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当前，国内科研条件和生态正在迅速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质量越来越高，为青年人才的发展提供了更大舞台。

-2022 年 12 月 9 日 人民日报

东华理工大学教授史维浚：踏遍山河探铀人

“史老师，您瘦了！”2021年全国教书育人楷模、东华理工大学的周义朋没有想到，数月没见，老师史维浚瘦脱了相，第一眼都没认出来。让他心里既难受、又敬佩的是，两个小时的探访时间里，这位最近连续做了五次手术的86岁老人，一手攥着各种管子，还不忘挺直了脊背，强打精神，反复询问试验进展，并问他还能做些什么。

周义朋不忍心看到老师强撑着，伸出手去扶住他的后背，以前宽实的肩背已瘦得皮包骨头，让他忍不住落泪。

不求名、不求利，一心只扑在核事业上，史维浚作为我国铀水文地球化学的领军人，不仅开创了我国水文地球化学模式的先河，还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从事铀水文地质化学研究的高层次人才，创建了我国铀水文地质化学团队。如今，这个团队里相继走出了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全国优秀教师和第二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扛钻机、抠矿石，为了国家需要义无反顾

出生于上海，史维浚读中学时新中国刚刚成立。见证过时势维艰，霸权欺凌，中学一毕业，史维浚便被选拔到苏联留学，在那里攻读水文地质工程专业。

在那里，史维浚了解到“铀”是核工业的“粮食”。而中国却是一个贫铀国家，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为此受制于人。

1960年，史维浚学成回国，便加入核工业中南地质局309队，为国家找寻铀资源，跋山涉水、风餐露宿，一干就是20多年。

“铀矿地质工作是光荣而伟大的，但也是极度辛苦和危险的，住

羊圈、扛钻机、抠矿石、吸矿粉……只要国家需要，我们就义无反顾地做好。”史维浚所在的地质队在湖南宁乡，他走遍了湖南的山山水水，找寻铀矿，编写地质报告。

1981年，史维浚作为我国铀矿领域的专家，被调入华东地质学院（东华理工大学），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没几年便成了学校铀水文地球化学、应用水文地球化学和地球化学模式学科带头人，编写出版的《铀水文地球化学原理》《应用水文地球化学》至今还是专业课教材。

“我入职学校前曾在野外地质队工作了4年，史维浚老师勉励我不断学习，考研究生。他本人也很好学，当时四五十岁还自学英语，只了解国际最先进的技术。”说话的是史维浚的学生刘金辉，现已成了水文地球化学方向的学科带头人。

在史维浚的激励下，刘金辉在1992年考上研究生，同年，史维浚以高级访问学者的身份，到美国科罗拉多矿业学院进行为期半年的交流访问。

“科罗拉多矿业学院在资源开发、开采及利用方面的研究实力属于世界顶尖，当时我主要学习地球化学模式、核废物处置。”史维浚觉得要学的太多了，半年过后，自觉没完全掌握核心技术，他自费留下，又学习了半年。

当史维浚学成归来，时任院长李学礼想请他做学校科技科研处处长，他却一再谢绝，理由是应该把这个岗位留给年轻人。

“专心投入科研当中，只要对科研和学生成长有利的事，花再大

精力他都愿意做，但涉及名利的事，他总是把自己放在最后。”刘金辉明白，史维浚对研究有极高的热情，带着学生做了很多科研项目、申请多项专利。2022年，身患重病的他，还亲自撰写了四份专利请求书；但他又不在乎名利，总是把后辈的名字放在前面。

“看着学生一个个成长起来，没有比这更让我觉得高兴的了。”史维浚认为这就够了。

退而不休、逐矿而居，破解“最难啃的硬骨头”

2001年，史维浚迎来退休，孩子们本想接老两口回老家安享晚年，可他不舍心爱的事业，依旧留在学校江西抚州的老校区内，做实验、带学生。

2002年，新疆十红滩铀矿开发遇到难题，地浸过程中出现严重的化学堵塞，先后有多批国内外专家走进这片戈壁滩，但都没能找到有效解决办法。

原来，与传统采矿不一样，铀矿地浸不需要开采矿石，而是通过注液钻孔向矿层注入试剂溶液，溶液渗流过程中将铀从矿石中溶出，再通过抽液钻孔将含铀溶液提升至地表……但当矿层地下水矿化度过高时，矿层和工艺管道会发生严重的化学堵塞，导致工艺中断，地下资源将变成“呆矿”。

彼时的十红滩铀矿，因矿化度过高，成为一个世界性难题。在李学礼和史维浚的带领下，东华理工大学科研团队毅然接下这个“难啃的硬骨头”，踏进戈壁滩。

十红滩与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一山之隔，戈壁腹地，一年四季没有

降水，寸草不生，沙暴肆虐，夏季地表温度可高达 88℃，冬季则泼水成冰；每年春秋两季风沙肆虐，沙尘暴一来便遮天蔽日。

试验人员的生活条件也十分艰苦，七八个人挤住在仅几平方米的老旧寝车里，寝车四处透风，只能用纸壳和胶带贴封，每遇风沙来袭，车内便沙尘弥漫，连睡觉都得戴上口罩。生活用水得从几十公里之外用水车运来。

为了解决十红滩铀矿开发难题，当时年近七旬的史维浚教授主动要求前往戈壁滩。由于现场条件十分艰苦，学校担心史维浚身体，只答应他在野外最多待一个星期。然而，到了戈壁滩之后，他全然“忘了”学校和团队的叮嘱，住铁皮房，吃馒头啃馕饼，和年轻人一起日夜奋战 40 多天，起早贪黑，直到现场试验工作全面步入正轨后，他才放心地离开戈壁滩。

周义朋起初没想到，平日在校园内风度翩翩，参加学生开题报告和毕业答辩时都会特意穿上正装的史维浚，会在漫天黄沙的戈壁滩上，穿着满是泥土的工作服，和大家吃住在一起 40 多天。也正是史维浚教授坚持在野外现场精心指导和严格把关，工程试验才得以按预定要求顺利开展起来，为项目顺利实施和研究取得成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事实上，当初团队走进戈壁滩时，并不被当时开发这个矿床的试验队看好，他们认为这些“书生”肯定吃不了这份苦，在戈壁滩待不了几天就会知难而退。没想到，这群人扎下来就不打算走了。这一扎，就是十几个春秋，为了解决复杂铀矿开采难题，团队转战天山南北，

逐矿而居，史维浚每年都要在野外待上一两个月，为现场试验把脉定向。

2019年8月，82岁的史维浚结束新疆野外工作，正式道别。周义朋和旁人都看出他很伤感，都明白史维浚舍不得离开他的事业。大家宽慰他：“后面还有得做，后面的事情还多着呢，您老以后每年还得来。”

后面有没有项目做，当时大家都不清楚，但大家明白对这位老教授而言，只要有事可做，就无比开心。

住铁皮房、啃饅餅，在戈壁滩上科研攻关

作为史维浚的学生，周义朋工作到30岁才再度迈进东华理工大学攻读研究生，正是在戈壁滩上实现了从研究生到博导的转变。

他反复说起第一次跟随老师去新疆实地科考的情景。“那时候史老师已年近70，但他坚持和我们同吃同住在野外寝车里，起得比我们早，睡得比我们晚，专注科研攻关，连续几天风沙导致物资供给不上，他就带头啃馒头。”

一个场景让他刻骨铭心：一位70岁的老教授，浑身是土，坐在地上，拿起绳子，把年轻人刚刚装好袋的沙土用麻绳扎紧……

造成十红滩矿床地浸化学堵塞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水中钙离子很高，史维浚认为，不去钙的话会影响工艺。但很多人认为现场没有条件去钙：一没物资，四周皆是戈壁滩；二没劳动力，方圆几十公里不见人烟。

史维浚就想到利用废弃的编织袋，找来铁锹，挖沙坑、垒沙袋，

组织学生花了半个多月，愣是靠大家的双手建成了满足试验要求的“去钙池”。

“大家拦着不让史老师干体力活，但他全程都没闲着，每天就坐在土堆边上，把我们填装好沙石的袋子一个个捆扎好，我们就这样一个沙袋一个沙袋地垒起去钙池的隔水墙。”周义朋佩服这位老教授，不仅佩服他对待研究严谨、较真儿的劲头，更佩服他凡事都自己带头、保持冲锋在前的姿态。

把学生放到试验现场培养，是史维浚带学生的一种方式，标准不是写论文，而是解决了哪些实际的问题。

“这些年，跟着史维浚老师走南闯北，每承担一个科研项目，他既欢喜又谨慎，欢喜的是‘马上又有一大堆事可以做了’，谨慎的是他深知每个项目都意味着未知的探索，他总是亲力亲为、如履薄冰，要我们珍惜机会，多出成果。”和史维浚共事了大半辈子，刘金辉明白，老师每次不仅要通过项目出一系列成果，还要利用这个机会培养出一批学生。

在戈壁滩的那段时间里，史维浚每天天刚蒙蒙亮就去实验室了。他先解决了现场测试分析的技术问题，又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分析测试手段。

“戴着耳机，一边学习英语，一边打扫实验室，调试仪器设备，等我们起来到现场，就可以直接开始工作了。”周义朋曾多次劝他不必如此辛苦，更怕他万一有个闪失。

“我知道你们担心我的身体，你们放心，我万一有个什么闪失倒

在工作岗位上，就是如我所愿。”年岁不饶人，史维浚越来越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争分夺秒、答疑解惑，让这份事业后继有人

“现在年纪这么大，说不定我哪一天说不行就不行了，趁着我现在还有用，你们要抓紧时间，现在不用，过期作废啊！”他多次叮嘱学生，即便自己有三头六臂，一个人也很难做出很大的事业，当下最重要的是抓紧时间把他掌握的这些东西传承下去，要让这份事业后继有人。

为搞清楚《铀水文地球化学原理》一书中的一些理论知识，2021年7月，在南昌校区学习的杨岚芝约了几个同学，到抚州老校区，找史维浚答疑解惑。

“每天早上8点到11点；下午2点半到5点，史老师把他家的客厅当成讲坛，给我们上了十几天的课。”杨岚芝每天一大早到史维浚家中，发现他已经用精致的果盘装好水果，用有印花的咖啡杯泡好咖啡，大家边吃边聊，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除了给学生上课，早已年过八旬的史维浚每天都会到实验室转转。通往实验室的是一段坑坑洼洼的老路，有时路灯都不亮。实验室在四、五层，史维浚每天都会出现在楼梯上，有时候会在爬楼途中歇一会儿……

“史老师，路不好走，实验室又这么高，您不用每天来，我们可以三四天跟您汇报一次，或者出了成果再去找您。”学生总是这样劝史维浚。

史维浚表面答应，但每天还是会来看，指导学生做实验，沟通一些问题，一聊到专业的知识就滔滔不绝，实验室里的学生都乐意和这位老教授打交道。

2021 年 11 月例行体检中，史维浚被查出肺部疑似肿瘤，医生建议他到上海复查。临行前，史维浚特意交给周义朋一个移动硬盘，并嘱咐里面拷贝了他这些年整理的所有试验数据资料。不幸的是，上海复查确诊是肺部和肝部肿瘤。考虑到年事已高不适合手术，只能做药物保守治疗。今年 7 月，史维浚病情恶化，肝部肿瘤增大压迫胆管，他不得不再次住进医院，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先后做了五次手术。尽管如此，史维浚放不下的，还是实验室的工作。

即便重病在身，史维浚还是会主动联系师生，询问试验工作的进展，强调数据的可靠性，嘱咐要把握试验的关键环节。与此同时，他还为学生修改论文，亲自动笔写研究思路，总结研究成果。史维浚一直与周义朋保持微信联系，周义朋知道老师的身体状况，总是劝他暂时放下工作安心治疗，然而两三句闲聊之后，史维浚又说到了工作上的事情。他始终惦记的是付出多年心血的浸铀新工艺的研发。在与周义朋微信交流中，史维浚这样说道：“为了我们共同的事业，我会注意身体。我向往着我们的事业成功的那一天。活着能为人民做些事情，真好，这是一种幸福。我们共勉！”

“今后工作很多，要实现工业化应用，还有很多工作要一步步地完成。时间不等人，因此，我们只有抓紧，才能实现奋斗目标。”最让史维浚牵挂的，还是国家的铀矿事业。

-2022 年 12 月 5 日中国教育报刊社

青年科学家陈树果：我的科研梦，尽在那片深蓝



陈树果在实验室。毛雷 摄

见到陈树果的时候，他正站在海岸边，一面指导着周围的学生，一面进行无人机测试。

“我们的工作是为海洋‘做体检’。”把无人机遥控器交给学生，这位年轻的副教授介绍，“想开发、利用、研究海洋，首先得认识它，了解各项‘体检指标’。我国近海海洋大气环境很复杂，虽然这几年中国自主海洋水色卫星遥感技术发展很快，但是数据怎么处理才能更准确，又该怎么确定误差和进行修正，这些都是我们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37岁的陈树果是中国海洋大学三亚海洋研究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也是国家卫星海洋应用中心的兼职研究员。他钻研海洋光学遥感十余载，由他率队开发的海洋光学卫星在轨替代定标算法，正服务于我国自主海洋水色卫星海洋一号C星和海洋一号D星的业务化定

标系统。近年来，陈树果负责的“海洋水体与大气同步观测系统建设技术开发”项目，实现了对水体与大气光学参数等长期、连续、稳定的观测，后续将应用于海洋一号系列卫星及新一代水色观测卫星的海洋遥感产品检验。

给海洋光学卫星定标，让数据更全面精确

陈树果和海洋光学遥感的结缘始于 2009 年。那一年，他考入中国海洋大学海洋信息探测与处理专业攻读研究生，第一次见到了大海。

“铁了心想搞学术。”陈树果的学术热情，从刚入学起就从未动摇过。他博士毕业后继续留在母校，围绕海洋光学基础理论和创新应用进行钻研。

“阳光照到水面上，部分被反射，部分进入水体被吸收，还有一部分会散射。海洋水色遥感就是通过接收这些散射的能量，分析光谱特征，反推水体的光学成分构成。”陈树果解释，“这些探测数据，对我国海洋权益维护、海洋资源开发、海洋环境监测、海洋灾害预报都有重要作用。”

对海洋进行遥感观测，效率最高、效果最好的方式是发射海洋卫星。从 2002 年首颗海洋水色试验卫星海洋一号 A 星发射至今，我国的海洋卫星发展走过 20 年，中国自主海洋卫星光学遥感器也在向着完全自主的“最后一公里”迈进。

定标，是指把卫星观测数据换算为真实辐射量的过程。“如果说卫星观测是杆‘秤’，那么定标就是给这杆秤加上‘准星’的过程，

能让卫星数据更精确。”陈树果说，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在定标算法上有待改进，也缺少必要的定标基础设施。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陈树果沉下心来，钻研攻关。阅读文献、发表论文、率队进行现场观测和实验……“我们对不同类型的水体大气环境进行了 20 多个航次的海洋光学综合实验。”陈树果说，大量的一手数据给后续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一边进行理论推演，寻找最佳算法，一边通过对大量数据的综合分析，确定定标场的选址。在海洋一号 C 星发射的前一个月，陈树果率队开发完成了中国自主海洋水色卫星的在轨替代定标算法。

多年现场观测，摇晃的甲板是第二实验室

海洋光学与水色遥感是以现场测量为基础的学科，为获取全面的海洋光学现场观测数据，多年来，陈树果工作于观测一线，将摇晃的甲板当成了第二实验室，把论文写在了海洋上。

对陈树果来说，大海是个脾气捉摸不定的“老朋友”。尽管已经打了 10 多年交道，比旁人更加了解它，但每次将观测仪器放入水体进行测量时，陈树果仍然既期待又不安，“海上观测不仅有恶劣的海况，还伴有水下的各种未知因素。时刻在变化才是海洋的本质。”

出海观测，一个航次大约 20 天。由于科研任务繁重，陈树果曾在多个航次中每天睡眠不到 4 个小时。截至目前，陈树果累计出海时间超 300 天，其中最长一次在西太平洋海域连续作业 74 天。“哪一个海洋人没做好做足吃苦的准备呢？”陈树果说。

热爱献给大海，大海也还陈树果累累硕果。2020 年，陈树果开

始负责国家卫星海洋应用中心“海洋水体与大气同步观测系统建设技术开发”项目。该项目将沿我国海岸线建立 8 个具有长期连续海洋水体与大气光学性质监测能力的检验系统，能在无人值守的条件下，实现对水体与大气光学参数等长期、连续、稳定的观测。

从中国自主海洋水色卫星的定标算法，到海洋水体与大气同步观测系统的建设，陈树果逐梦深蓝的步伐从未停歇。

脚踏实地，真正做些原创性的工作

2019 年冬天，中国海洋大学三亚海洋研究院举行揭牌仪式，正式入驻三亚崖州湾科技城。2020 年 5 月，陈树果从黄海岸来到了南海边。

“我们要建海洋水色卫星的定标场，南海海水更清洁，近岸水体大气的复杂性没那么高。”加入三亚海洋研究院后，陈树果牵头建设了海洋水色遥感定标实验室，不仅能有效支撑我国自主海洋水色卫星系统替代定标场的维护，还能服务于各高校和科研院所海洋光学仪器的定标，保障测量的数据准确性。

如今，陈树果的学生分布在青岛、三亚两地，还有一部分高年级学生在北京的国家卫星海洋应用中心实习。“我们每次线上开组会都‘纵跨’南北，有人在学校上课，有人在实验室科研，有人在中心实习。”陈树果笑着说，“边学边想边实践，产学研融合嘛。”

海洋是一座巨大的资源宝库，建设海洋强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任务。20 多年前，中国还没有自己的海洋卫星，想了解我国近海水体大气情况需要从国外购买数据；如今，一批批科学

家共同努力，推动海洋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中国海洋卫星已进入组网观测时代，不仅形成对全球海域连续高频次观测覆盖能力，数据也已与国际先进产品具有相同精度。“认认真真做好本职工作，就是对国家最大的贡献。”陈树果说。

-2022 年 10 月 27 日人民日报

中国工程院院士、南昌大学教授谢明勇：小小益生菌发酵果蔬大产业



谢明勇（左三）在实验室。资料图片

近日，在目前我国食品领域唯一的学科类国家重点实验室（联合江南大学）——南昌大学食品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里，谢明勇正在指导团队成员开展益生菌菌种的筛选实验。

中国工程院院士、南昌大学食品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谢明勇教授是土生土长的江西人，本科毕业于江西工学院（现南昌大学）化工系，尔后，他的学业和科研生涯都与食品科学有关。

1998年，谢明勇从海外博士毕业后，放弃国外优厚条件，来到南昌大学开展科研工作。在江西乐平的一次科技下乡活动，深深刺痛了他和团队。那天，谢明勇带领的食品团队在一个集贸市场看到，一位老乡把一车大约2吨的圆白菜，以10元的价格贱卖了。“这么便宜就卖了，不亏吗？”“亏啊，可要是还不卖掉，我连这10元钱都赚不到。”老乡无奈地说。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果蔬原料生产国，加工率却远不及发达国

家，每年新鲜果蔬腐败损耗率高达 20% 以上，损失达数千亿元，严重影响我国果蔬业发展。”谢明勇回忆，这件事让他将研究课题方向锁定在了果蔬益生菌发酵技术上。

寻求先进的果蔬精深加工技术，提高果蔬产品加工率，成为谢明勇团队研究的主攻方向。经过反复论证，他们决定把益生菌发酵技术引入果蔬现代加工领域。为寻找到适合果蔬发酵的专用益生菌种，谢明勇和团队开始了艰难探索取样。

“我们走了全国十几个省份，采样来了以后，我们实验室从这些样品中把菌种再分离出来。这个分离的过程就非常长了，筛到这么一个菌可能就要花好几年的时间。”谢明勇介绍，最终经过 5000 多个日夜的不懈努力，团队筛选、分离、保藏果蔬发酵专用菌种 8000 多株，并从中发掘出具有果蔬发酵优良特性的益生菌 300 多株，建立了我国首个果蔬发酵专用菌种库。

他们研发的益生菌发酵果蔬曾陪伴国家科考队奔赴南极，也跟随南海舰队潜入深海，还跻身航天食品研发行列。

随后，谢明勇对自己及团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实现益生菌发酵果蔬的量产。为此，他带领团队进行了大量试验，突破菌种高通量筛选复合菌剂规模化制备等关键技术瓶颈，创建了果蔬益生菌发酵上中下游全产业链关键技术创新体系。

作为一位师者，他传道授业，毫不吝啬地将自身所学倾囊相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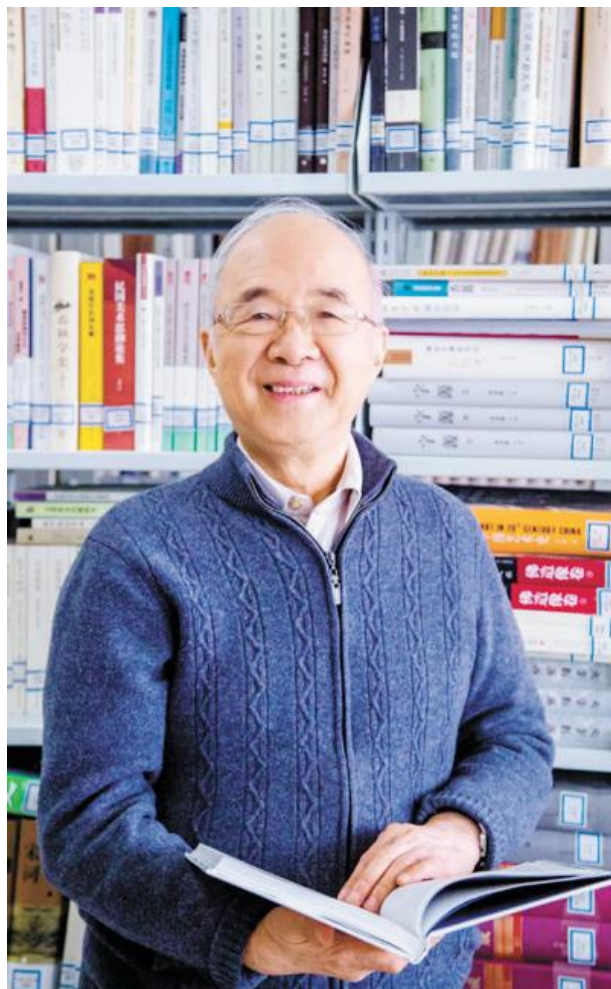
“我第一篇公开发表的学术文章，是经谢老师之手，修改了很多遍。”师从谢明勇 20 余年的南昌大学食品学院院长聂少平说。

对于年轻科研人员，谢明勇总是寄予厚望。他最热衷的，就是为学生“出思想、指方向、压担子、给条件、铺好路”，甘愿当一名科研新军的“后勤部长”。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谢明勇表示，下一步将牢记嘱托、锐意创新，聚焦“全面建设创新江西”奋斗目标，坚持不懈地从事营养健康食品方面的科技创新工作，在红土地上浇灌出更加绚烂的科研硕果；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甘做提携后学的铺路石和领路人，力争为国家培养更多的科技创新人才。

-2022 年 10 月 26 日中国教育报

八旬教授曾繁仁：“做学问，要从国家需要出发”



曾繁仁在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查阅资料。山东大学宣传部
供图

曾繁仁：1941年生，安徽泾县人，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重点学科山东大学文艺学学科学术带头人；长期从事美学与文艺美学专业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出版《生态美学导论》《中西对话中的生态美学》《美育十五讲》等著作10余部，主编《中国美育思想通史》（九卷本）等。

已过耄耋之年，满头银发的曾繁仁，谈起生态美学，思路十分清

晰……

“对我而言，治学是人生价值的持续提升”

1964年7月，曾繁仁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同年留系任教，从事美学与文艺学研究。1987年秋，受学校委托，曾繁仁赴豫开展项目合作。他们一行七八人，乘着一辆面包车出发，跨越黄河大桥，穿越鲁中、鲁西南、河南兰考，直达河南开封市区。

当时，我国各地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沿途中，一座座化工厂冒着柱柱黑色浓烟，造纸厂污水横流，渗入十几公里外的地下，一方方良田沃土被污染，空气中弥漫着呛鼻的气味……”曾繁仁回忆。

“走一程，痛一程。为了经济发展，我们国家的生态系统受损问题多、历史欠账多。”曾繁仁在心中作出论断。

回到学校，曾繁仁时常琢磨，如何发挥绵薄之力，结合自身所学，为改善当下生态问题做点事情。曾繁仁觉得，美学中应该发展出一门学科，将人文性、审美性与生态性统一起来。

后来，曾繁仁联想到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到的“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学说，还有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天人合一”的学说。这就让中国传统文化与生态美学发生了关联，他立足中国现实，提出了“生态存在论美学”，并一挥而就完成万字论文《生态美学：后现代语境下崭新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观》。

两年后，曾繁仁在原有论文基础上出版了个人首部生态美学论著《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进一步诠释了他的观点：生态问题归根到

底是人的问题，倡导人类应该以一种普遍共生的态度对待自然环境，同自然环境处于中和协调、共同促进的关系。

那篇万字论文成为我国生态美学的代表性论文之一。该文与《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共同奠定了曾繁仁研究生态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并为生态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人文价值观上的思考。

“对我而言，治学是人生价值的持续提升；做学问，要从国家需要出发。”曾繁仁说。

“力求将求异与求新的治学精神延续到教书育人中”

1959年至1964年，曾繁仁在山东大学中文系读书。“求学期间，系里‘大师云集’，冯沅君、陆侃如、萧涤非、高亨等教师，代表了当时文学研究的高峰，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优秀学子，这四位前辈都曾给我上过课。”曾繁仁回忆。

当时，系里的教师们偏爱让学生发言，“例如，高亨先生给我们上《诗经》与《左传》课，我们在每堂课结束后，都要围在高先生身边，向先生问学。我们对先生的学术都很景仰，经常引用先生以及前辈的学术观点。”曾繁仁回忆。

“不要老是提高亨怎么说，而是要提出你的新说，否则就是重复，没有意义和价值。”高亨先生对大家说道，“你们讲讲，有没有新看法、新发现？”

在教师们的引导下，系里讨论氛围浓厚，“大家都在尝试求新，积极参加学术讨论，手里捧着著作，引经据典，甚至与老师展开激烈讨论……”曾繁仁说。

曾繁仁说他“力求将求异与求新的治学精神延续到教书育人中”。他常把学生聚在一起，开展学术讨论，鼓励大家推陈出新，“我的博士生在写博士论文前，我都会问：你的研究与前人有何不同、提出了什么新问题？”曾繁仁说。

学术攀登创新之路，未曾止步。2010年，已近古稀之年的曾繁仁，再度完成《生态美学导论》一书，这是国内首部综合中西古今资源、全面论述生态美学这一崭新美学理论形态的论著。

“‘追求真谛，创立新义，力求出言有据，避免游谈无根’，高亨先生这句话，让我受益一辈子！”曾繁仁说。

“做点有意义的学问，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智慧，让世界听到中国声音”

曾繁仁家中，珍藏着一张合影：“照片拍摄于2009年召开的‘全球视野中的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曾繁仁说。

当时，曾繁仁做了一篇关于生态美学的报告；会后，一位西方的美学理论家找到他说：“想不到中国学者对于西方这么了解，也想不到中国学者对于生态美学有这么全面的研究。”

曾繁仁对于学术研究的国际交流十分重视。2005年以来，在他的身体力行下，山东大学多次召开生态美学相关大型国际会议，持续向世界发出中国声音……

“学术界曾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学’与‘生态’等都是国外输入的理论，中国没有本土的‘生态美学’。”曾繁仁意识到，生态美学进一步发展的重要课题之一，就是“中国话语”建设。

从 2017 年开始，曾繁仁转向生态美学的中国形态研究，提出了“生生美学”，建构中国特色的生态美学。翻开《曾繁仁学术文集（十）·生生美学》一书，略扫一眼目录，就会发现此书内容广泛，涵盖古琴、敦煌壁画、中国书法，等等，内容颇为细致。

“‘生生美学’，以《周易》为出发点，依托光辉灿烂的中国传统艺术，必须博览群书，从浩繁卷帙中汲取精华，才能研究得透、研究得好。”曾繁仁不好意思地笑了，“你看，家里挺乱，到处都是书。”

几年前，年近 80 岁的曾繁仁与爱人一同踏上火车，奔赴甘肃，“他总说，仅研究书中的敦煌壁画，还是差点什么，非要去实地看看。”曾繁仁的爱人笑道：“看到敦煌壁画的那一刻，他的眼睛都是发光的，边看边记；回来后，都写进了书里。”

研究“生生美学”，曾繁仁形成了一个小习惯。“有时，我俩正在外（面）遛弯，他忽然着急回家，原来是想到了新观点，得立刻记到本子上；吃着饭时，有新想法，赶紧放下筷子去记下。”曾繁仁的爱人拿出一摞手稿：“这些都是他近期记的。”

问他为何如此痴迷。曾繁仁思索片刻，抬头答道：“在我这样一个年龄，做点有意义的学问，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智慧，让世界听到中国声音，这就是我自己追求的人生价值所在。”（记者李蕊）

记者手记：致敬“文章合为时而著”

“60 岁，对多数人而言，已是退休的年纪，而您却毅然进入一个自己以前并不熟悉的新兴领域，并开拓出全新的局面，背后的动力是什么？”采访时，记者问道。曾先生答道：“在于‘使命’二字。”

多年来，曾先生殚精竭虑、勤奋治学，把理论研究与社会关切结合起来，让书中的理论变得更有温度。从时代发展的现实境况中提炼学术问题、选择研究方向，是曾先生治学的基本路径。梳理曾先生数十年在美学和文艺理论领域的丰富成果，可见其背后跃动着时代发展的脉搏。可以说，他是中国当代学者“文章合为时而著”的典范。矻矻穷年，学术报国，这正是曾繁仁心中的使命，值得后辈学习！

-2022 年 10 月 25 日人民日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教育部

关于落实从业禁止制度的意见

(法发〔2022〕32号)

为贯彻落实学校、幼儿园等教育机构、校外培训机构教职员工违法犯罪记录查询制度，严格执行犯罪人员从业禁止制度，净化校园环境，切实保护未成年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以下简称《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以下简称《教师法》）等法律规定，提出如下意见：

一、依照《刑法》第三十七条之一的规定，教职员工利用职业便利实施犯罪，或者实施违背职业要求的特定义务的犯罪被判处刑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和预防再犯罪的需要，禁止其在一定期限内从事相关职业。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对其从事相关职业另有禁止或者限制性规定的，从其规定。

《未成年人保护法》、《教师法》属于前款规定的法律，《教师资格条例》属于前款规定的行政法规。

二、依照《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实施性侵害、虐待、拐卖、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的人员，禁止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工作。

依照《教师法》第十四条、《教师资格条例》第十八条规定，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不能取得教师资格；已经取得教师资格的，丧失教师资格，且不能重新取得教

师资格。

三、教职员工实施性侵害、虐待、拐卖、暴力伤害等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判决禁止其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工作。

教职员工实施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犯罪，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和预防再犯罪的需要，依照《刑法》第三十七条之一第一款的规定，判决禁止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者假释之日起从事相关职业，期限为三年至五年；或者依照《刑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第七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对其适用禁止令。

四、对有必要禁止教职员工从事相关职业或者适用禁止令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应当提出相应建议。

五、教职员工犯罪的刑事案件，判决生效后，人民法院应当在三十日内将裁判文书送达被告人单位所在地的教育行政部门；必要时，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将裁判文书转送有关主管部门。

因涉及未成年人隐私等原因，不宜送达裁判文书的，可以送达载明被告人的自然情况、罪名及刑期的相关证明材料。

六、教职员工犯罪，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生效后，所在单位、教育行政部门或者有关主管部门可以依照《未成年人保护法》、《教师法》、《教师资格条例》等法律法规给予相应处理、处分和处罚。

符合丧失教师资格或者撤销教师资格情形的，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及时收缴其教师资格证书。

七、人民检察院应当对从业禁止和禁止令执行落实情况进行

监督。

八、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发现有关单位未履行犯罪记录查询制度、从业禁止制度的，应当向该单位提出建议。

九、本意见所称教职员工，是指在学校、幼儿园等教育机构工作的教师、教育教学辅助人员、行政人员、勤杂人员、安保人员，以及校外培训机构的相关工作人员。

学校、幼儿园等教育机构、校外培训机构的举办者、实际控制人犯罪，参照本意见执行。

十、本意见自 2022 年 11 月 15 日起施行。